
从原生性的大问题切入新政治学

王绍光*

我想围绕题目讲三个关键词。我先讲新的政治科学，“科学”这个词值得商榷，现在为止研究政治还没有达到科学的水平，所以我建议改称政治学。但是，新政治学不仅仅是把西方那一套政治学的话语、理论、方法和分析框架本土化，本土化的话题已经谈了很多次，西方很多东西不一定适合分析中国。很多人在西方话语里面没有出来或者对此没有清晰的认识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需要进一步讲本土化。但是，新政治学比本土化的含义更丰富。

几乎从人类形成国家这种现象开始就有政治方面的研究。西方古典政治研究一直延续至 17、18 世纪，最关注如何找到一个最好的政体，柏拉图、格劳秀斯都是这么讲的，中国也是这么讲，研究政治问题有很多不同的套路，不同时代也有很多研究，大家都关心这类问题，当然也研究治国理政的方法，这些是原生性的政治研究议程。西方国家规模通常比较小，比较容易说清楚，中国从来就很大，往往需要讨论哪一种治国理政的方法更好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，冷战开始后，西方政治学的所谓现代行为主义革命有一个基本假设，就是政体问题解决了。大问题解决了，只研究小问题，只谈大国治理的最佳方法，谁得到什么东西？怎么得到的？得到多少？为什么？这种实证主义假设大问题已经化解了，它研究国内问题的时候，只研究政党、政治组织、利益集团等。至少主流意见认为大的方向性问题已经解决了，没有解决的是西方以外的国家，所以要向非西方国家推销他们认为最好的治国理政方式，西方至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，一直到冷战结束，再到十年前都有这种自信心，这

* 王绍光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。

就是政治学走上巅峰的时期。

但是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我们再来看西方政治学，如果不看细枝末节、只关注主流刊物，看他们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问题，很多人说大问题可能并没解决，什么是最好的政治体制可能没解决，什么是最好的治国方式可能没解决。我最近对治理做了思想史探究，冷战结束前不久，有人开始注意这个词，当时有一些右翼知识分子想脱离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左翼影响，他们想走另一条路，所以治理实际上是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复活起来。2017年世界银行报告的前三章重新反思政体问题，虽然不太深刻，但至少认识到只关注政体形式是不够的。西方曾经信心满满，认为大问题已经解决了，只关注细枝末节的问题，但是，这个时代可能正在过去。

中国有更重要的理由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政治学的主流话语、思维方式、概念体系和方式方法，所以我觉得讲新政治学应该是回到原生性的问题上，探究什么是治理国家的比较好的形式、比较好的途径，这个问题其实没有解决。西方有一段时间非常自信，忽略了这个问题，反倒把很多问题积累到现在，比如移民问题、福利国家问题。现在，我们可以在同一个起跑线思考新的政治学，重新思考什么是好的治国方式方法这种问题。因此，不仅仅中国需要新政治学，西方和全球各个地方也都需要。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政治学，假设政治世界是非意识形态化的，只解释世界不改造世界，这是一厢情愿的不切实际。新政治学既要解释世界还要改造世界，找到治理某个小共同体乃至整个人类共同体的比较好的途径。提出新政治学，放在历史视野下来看，恰逢其时。

当然，思考新政治学有很多思路可以切入，从中国共产党切入也是很好的，所以我讲的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党。中国共产党确实符合教科书上的政党定义，但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的党不一样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党也都不一样。中国香港所有党员加起来可能只有几千人，和我们通常理解的党不是一回事儿。美国政党是“三无政党”，欧洲研究政党的人不研究美国政党，因为它根本不符合欧洲人理解的党，美国没有固定的党员，没有党纲，不交党费，它只有竞选筹款功能，你投哪个党的票，就是哪个党。日本政党内部有很多派系。欧盟有五亿人，有党员、组织、党的纪律、党费、党纲，但这种党政正在瓦解，现在几乎所有数据，除了东欧国家的数据有些不一样，其他的都已经不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那种大众党结构了。因此，所有政党都是特殊的，并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就特殊，

大家都很特殊，都不一样。

大家都很熟悉“党国”这个词的历史，近现代中国一盘散沙，输掉了每一场对外战争，国内民众无法整合在一起，碰到一小群武器比较高级的人，就败下阵来，所以中国人想到要借助苏联列宁主义政党的方式，用“政党国家方式”解决一盘散沙问题。这其中的机制究竟是什么？为什么不用国家的机制，用国家的结构解决所谓的党，苏联列宁主义性质的党所解决的问题，会有什么不同。不同之处很可能是，国家机构最多只能提供一个躯干，但是不能提供灵与肉，列宁主义的党可以提供灵和肉，有灵魂和肉可以填满躯干。中国在所有方面都追求最小化，国家机构非常小，没有能力渗透方方面面，有了政党也许就可以。

但是，国民党的“党国”从历史角度来评价的话，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在当代中国形成一个现代国家架构，也就是黄仁宇讲的上层结构。但是，因为它的基层党员、党的基层干部和土豪劣绅是一回事儿，没有办法渗透到底层，所以它最终失败了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我们也可以说有某种政党国家体制，但是梳理一下会发现毛泽东的党国关系非常不一样，新中国成立前叫“以党建国”，以前没有国，先有党先有军队，然后新中国成立才有国家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在很大程度上是“以党统政”，党的机构跟政府部门几乎一一对应，这些机构现在没有了，党可以管理所有事情，跟国家机构一起管理，这种状态可能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前。这个时候称之为政党国家体制是比较恰当的。

邓小平多次讲党政分开，当时想方设法把党政分开，但是分了很长时间之后，碰到两种可能性，一个是分不开，另一个是如果分开危险极大。所以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一直讲党政分开，最后发现没法分开，所以现在讲最多是党政分工，不会有党政分开。

但是，现在和毛泽东时代不一样，以前党有农村工作办公室、农村部，现在某些地区恢复了，以前党有交通办，现在党的机构里面都不涉及这些方面。所以现在更像一个“国党”，而不像一个“党国”，因为国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克服一盘散沙的问题，但还有一些问题不能处理，比如动员问题靠国家机器不一定完成，所以还靠政党机制。但是大量的事情，刚才黄嘉树讲得很好，公检法已经开始垂直管理，国家机构在垂直管理，国家机构很大程度上已经可以解决。党在国家机构以外来解决一盘散沙和动员问题，这是某个时代情况下不得已和必须做

的事情。但是，每个时期不一定是同样的比重、同样的方式，现在更多是靠国家机器。

现在共产党的定位叫作“总揽全局、协调四方”，这个概括相当不错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表明，党其实可以依靠国家机构管理绝大多数事情，具体就是两件事，一个是总览全局，一个是协调四方。打个比方，现在国家机器是木板，党是木箍，把木桶保持在一起，需要动员的时候能够很快动员，这是党委、组织部、宣传部、统战部等党的部门的主要功能。

最近一两年出现了一些与前30年不太一样的地方，中央一竿子插到底的现象多起来了，前30年很少看到巡视，现在督查在很多地方都常态化了，还有新的巡查方式，它的好处坏处可能过一段时间再评估会更加客观。但是，至少做法跟以前有点不一样，以前放得很多，中央一级的垂直管理、省以下的垂直管理等方面在1993年税制改革以后尤其是2000年以后慢慢出现，这些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

最后，我们要探究的大问题就是，政党国家体制到底是不是一种一劳永逸、一成不变的好的治国理政方式？如果是，我们要说清楚理由。如果不是，我们回答什么情况下是？什么情况下慢慢变成不是？还有更重要的问题，这样的体制有很多好处。我们现在强调比较多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，最大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。但是什么情况下慢慢不必要？或者成本比较高？我们也要讨论实证性的问题，方向性的问题，包括政治继承问题，内容非常丰富，希望年轻人做出更多努力。谢谢各位！